



HONGLOU SHUGUANG
ZHONGGUO GONGCHANDANG
DE DANSHENG YU BEIJING DAXUE

红楼曙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

宋修见 著



人民出版社

红楼曙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

宋修见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海静

责任校对：刘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 / 宋修见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7-01-017973-5

I. ①红… II. ①宋…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②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IV. ① D23 ②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3411 号

红楼曙光

HONGLOU SHUGUANG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

宋修见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198 千字

ISBN 978-7-01-017973-5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序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没有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作为它的阶级基础，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同样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作为它的思想基础，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在党的筹建过程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北京大学对党的成立所作的贡献特别表现为四个“中国之最”：

第一，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李大钊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接受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早在1913年至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7年11月上旬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先是担任图书馆主任，后又兼任经济系、史学系教授。当俄国十

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的消息陆续传到中国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去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以积极的心态去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1918年1月，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题目叫《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标志着他的世界观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同年晚些时候，他又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上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说：十月革命的功业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李大钊在文章中自觉把十月革命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十月革命的胜利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对各国革命的指导性。1919年元旦，李大钊又在《新纪元》一文中说：“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到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李大钊的上述认识，代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革命运动的新开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广泛传播的开始。

第二，最先在中国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自

1918年开始,北大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基地。在李大钊的指导、带动和影响下,北大涌现出一批热心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研究会”,对外称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实际上开展马克思学说研究,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何孟雄等在北大又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登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示》),旗帜鲜明地宣告“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研究会的活动受到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得到很多进步师生的响应。1920年12月,由李大钊等人发起,又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其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相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研究会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出成立《通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是当年北京乃至全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进步的北大师生积极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注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五一”节这天,他们在北京城内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纪念劳动节专号”;他们还曾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专门到长辛店各工厂去搞宣传,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第三,最早在中国大学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先后正式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工人的国

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或讲座，经学校同意，将这些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及考核范围。这在当时反动派加强思想统治、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的情况下，实属大胆之举，在中国高等教育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

第四，是筹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基地。1920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头在上海和北京积极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3人，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占21人。在这21人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是党的主要创立者，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范鸿劼、谭平山、沈雁冰等，则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骨干。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共13人中，曾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有6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发展中，北京大学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这一点不容置疑。

为什么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能有如此密不可分的联系呢？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由宋修见最新撰写的《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一书，认真研究并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两个特别有价值的问题：一所大学何以能够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诞生的“衣胞之地”？一群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最终挽救一个民族的危亡命运？本书紧紧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从北京大学在列强入侵的民族危机中诞生讲起。正因为北京大学肩负着兴学图强的使命，在蔡元培校长整顿改革以后，能迅速汇聚起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下，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然后致力于研究、传播和践

行，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理论准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践行的过程中，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走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在工人运动中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干部准备。与此同时，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建党，从理论宣传到实际组织工作方面，在上海和北京南北呼应，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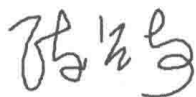
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论证过程是令人信服的。北大师生的奋斗探索，就是要为苦难中的人民谋幸福，为屈辱中的民族求解放，这是他们“直接行动”直至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动力和坚定信仰。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力量，他们奋斗不已，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北大红楼，是一座1918年秋季落成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五四运动期间，这座建筑是学校总部和文科所在地。当年，李大钊即以设在北大红楼一层的图书馆为阵地，组织和领导北大的进步师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红楼是五四时期北大的灵魂，是北大的象征。本书取“红楼曙光”之名，寓意深刻。作者通过对“曙光从红楼中升起”的历史脉络的梳理，以及对“曙光为什么从红楼中升起”的内在逻辑的分析，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2012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出版宋修见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一书，这是他在北大攻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学位的同题博士论文，文中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北大为

什么能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最早基地这个问题，曾受到广泛的好评。本书可以视为其博士论文的延展研究。这一研究对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性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大学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曾经说过：“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大万万岁的欢呼。”作为北大人，包括每一位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人，都应该牢记先辈的嘱托，为学术的发展而不懈努力。我衷心祝愿作者和更多的年轻同志都能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收获。



2016年5月30日

陈占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召集人。

第一章	北大的诞生：世变之中的兴学图强梦	1
第一节	1840 年后的世变之亟与兴学之议	3
第二节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与艰难前行	13
第三节	从旧官僚养成所到新青年摇篮	21
第二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在历史的节点上	37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传入与思潮纷涌	39
第二节	在各种主义的辩诘中“择定一派”	46
第三节	十月革命的决定性影响	61

第三章 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 73

第一节 李大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 74

第二节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历史贡献 87

第三节 对“理论准备不足”问题的再认识 103

第四章 势之所至：五四运动与“直接行动” 113

第一节 唤起自觉心：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呐喊 115

第二节 五四运动：“新青年”登上历史舞台 123

第三节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开辟 136

第五章 干部准备：北大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143

第一节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与发展 144

第二节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与北大的影响 151

第三节 青春的力量：邓中夏和高君宇的奋斗 160

第六章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曙光的升起 173

第一节 北大红楼两巨人：南陈北李的建党伟业 175

第二节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直接影响 186

第三节 “一大”代表中的两位北大学生 191

第七章 来自北大的革命火种：红楼曙光照亮中国 201

第一节 中流砥柱：“一大”后各地党组织与北大 203

第二节 从容莫负少年头：北大英烈与中国革命 209

第三节 前赴后继：王复生和王德三兄弟的故事 214

结 语 信仰的力量：曙光何以从红楼升起 223

主要参考文献 239

第一章



北大的诞生：
世变之中的兴学图强梦



纵观人类文明史，一所大学和一个政党的诞生以及一个国家的命运转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除北京大学外，恐怕很难找出可与之比肩的第二所。这既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外部条件所使然，也是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勇于担当使命的内在逻辑之必然。



今日北大西门（摄影：李森）

1840 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在没有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有实质性交流借鉴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大一统帝国。从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以后，虽然历经朝代变迁、盛衰兴替，但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社会治理和文化演变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这种典型的东方文明很难一言以蔽之。皇权帝制、家国天下，儒道互补、天人合一，耕读

传家、守望相助……这一切，实际上都与以采邑制为主要形式的欧洲封建制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文化形态大不相同。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延续了 2000 多年。

但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坚船利炮开始进行全球资本扩张与文化输出，晚清帝国开始面临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列强环伺之下，变法维新，兴学图强，乃势在必行之事。但京师大学堂的诞生与发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幸的是，后来蔡元培执掌北大，他端正学风，延揽人才，建章立制，很快使这一旧官僚养成所脱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

第一节 1840 年后的世变之亟与兴学之议

1793 年，大英帝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以补祝乾隆 80 大寿之名远道来访，旨在建立商业往来等合作关系。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国王的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最神圣的乔治三世陛下，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法兰

西和爱尔兰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时值乾隆五十八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时期。在9月14日觐见乾隆之前，马戛尔尼与清廷就觐见礼仪有过争议，最后清廷妥协，马戛尔尼使团仅行单膝下跪之礼而不需三叩九拜，但同时也免去了接触皇帝身体的“吻手之礼”。后来清廷也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所谓商业要求。这次“礼仪之争”一方面被认为是清廷抱残守缺的盲目自大，为日后战争种下祸因；但另一方面也被看作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冲突，是英国现代国家“主权平等”外交观与清廷传统王朝“差序包容”的天下观的碰撞。有意思的是，当



北大校园内勺园石碑(摄影：李森)

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被安排的居所——勺园，恰恰位于今天北京大学校园的西北角。

随着 1840 年以后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机。觉醒了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兴办新学，培育人才，才是强国的根本之道，因此在“戊戌变法”中京师大学堂得以诞生并在变法失败后又幸得延续。

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降临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答问时讲道：

看待当今中国，一定要深刻认识中国近代以后所遭受的民族苦难，一定要深刻认识这种长期的民族苦难给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

是的，只有深切地理解这些苦难，才能够读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仁人志士的奋斗牺牲，读懂 170 多年来中国的改良、革命、建设直至改革开放事业的直接原因、根本动力以及独特而复杂的演进逻辑。

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时候，英国就开始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讲到，在 1800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 2000 箱。这不仅极大地恶化了清廷的财政危机和吏治腐败，也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